

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时期的孙科评价浅议

左 双 文

关于对抗战时期孙科的评价，史学界一直少有直接、正面的专门论述，偶尔涉及，也多是一带而过。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孙科的政治立场究竟如何？在国民党抗战派、顽固派、投降派等派别中，他属于什么派？

这里想先引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中的一段话。在这个指示中，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孙科、冯玉祥、李济琛、于右任、陈嘉庚、陈光甫、黄炎培……等为代表，这个阶层至今基本上还没有政权，还是我党较好的同盟者”，是“要求亲苏和共与政治改良”^①的一派。

从抗战时期的有关史实来看，应当说，这个评价大体上是恰当的，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地分析和评价孙科，仍是值得重视的意见。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

其一，孙科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高层最早力主对日抵抗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抗战后期主张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二八事变后，“孙哲生先生等二十余人请政府增兵，派飞机前往援助”^②。孙科并打电报给何应钦，斥其抵抗不力，乃“甘心亡国”之举。

1932年3月6日，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孙科等22人提出《确定长期抗日方针案》。4月27日，孙科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提出了“为集中民族力量，贯彻抗日救国之使命”而对内政、外交、党务进行一系列重大调整的主张，包括筹备宪政、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允许其他抗日党派合法存在、恢复国民党的民众立场、以彻底抗日为目前外交之主要方针等内容^③。

12月15日，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孙科等27人又提出《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指出“今日最重要而待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然欲彻底抗日，必须内部一致”。并指出过去“政府之所以未能积极抗日”，是因为担心内部不一致，而内部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政府、在于中央。因此，中央只有“对外确定抗日方策”，“对内政治开诚布公”，才能改变目前这种混乱的局面。

12月20日，孙科又在“总理纪念周”以“如何集中国力挽救危亡”为题发表演讲，指出中国国民党要顺应“全国人民的心理和要求”，停止内争，积极抵抗日本侵略，以挽救国家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485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页。

③ 孙科：《中国的前途》，商务印书馆1943年江西版，第207～209页。

危亡。他指出,想依靠国联来制止日本侵略已毫无可能,唯有依靠我们自己,唯有“团结一致,集中全国的力量”^①,积极抵抗,才是唯一的出路。

1932年,是孙科政治态度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年初,孙科在反蒋的“非常会议”之后出面组织的内阁不足一月即告夭折,国民党回复到蒋汪合作、蒋再度掌权的局面。孙科一系列要求抵抗侵略、改革内政的主张一方面表现了对蒋介石内外政策的不满,是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反映;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严重,停止内争、一致对外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题,孙科的主张客观上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把握了时局变化的脉搏,作出了比较迅速、比较准确的反应。

因此,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提纲”的报告,明确将孙科列为“九一八”后不甘屈服、反对投降的一类人,说明中共对孙科是相当肯定的。

抗战后期,日本法西斯败局已定,关于战后安排的问题日渐重要,特别是战后对日处置问题,与中国关系尤为密切。孙科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身分,公开发表《彻底毁灭日本寇国》、《消灭日本天皇》等文章,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张。提出,中国应收复自甲午战争以来被日本掠夺的所有失地;要彻底消灭日本的陆海空军,解散其军事教育机关,褫夺日本法西斯赖以发动战争的资本;要惩办日本战争罪犯,解除其工业武装,根绝日本法西斯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日本必须对发动侵华战争造成的损失作出物质上的赔偿;中国必须拥有对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特别是对日处置的发言权;中美等国得对日本实施军事和行政的监督,使军阀统治下的日本由此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等等。并对同盟国内一些人在这类问题上的各种错误主张如“中国威胁论”、保留部分日本实力的“国际均势论”、阻碍中国收复台湾的“台湾国际共管论”等进行了批驳。孙科的上述言论,在当时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新华日报》上曾几次转载他的有关文章。

其二,在对苏友好合作方面,1932年12月在《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孙科等人提出“以彻底抗日为目前外交上主要方针……积极进行中苏邦交之恢复”。全面抗战一爆发,孙科即向蒋介石建议加速与苏联结盟的步伐,7月中、下旬,多次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促成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1938、1939年,孙科两度出使苏联,在争取苏联对华2.5亿美元军援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孙科对蒋介石联苏政策缺乏连续性颇感忧虑,1939年12月28日,他对冯玉祥说,“苏联对我们帮这么多的忙,我们要是疑惑他,他也一定会疑惑我们的,要是这样,国家实在是不得了。”^②孙科长期担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经常在文协主办的《中苏文化》上发表文章,为维护战时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做了许多工作。

其三,在与中共的关系上,孙科1932年4月在上海发表的《抗日救国纲领草案》,其中已含有只要共产党遵守法律,可以允许其存在的意思。1935年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孙科很快作出了积极响应。根据“一二八”之后孙科的表现,在西安事变爆发次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分析了南京政府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努力争取冯玉祥及孙科……等,孤立何应钦等亲日派”^③。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孙科又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紧急提议《恢复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案》。周恩来后

① 《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434~435页。

② 转引自《冯玉祥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65页。

③ 董小鹏:《风雨四十年》第1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来曾将之视为“跟我们合作的运动”^①。1938年孙科访苏时，苏方对国共关系“未能融洽”表示不安，孙科对此十分重视，在返国途中即致电蒋介石，提出对此类事“应急改善”^②。1940年7月，孙科在报刊上公开赞扬中共对团结抗战的贡献，指出：保持团结统一，实现民主宪政，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首要条件，而“首先表示促成这个统一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一般人谈起统一，便联想到共产党。这是因为共产党对统一有很大的缘故”^③。抗战后期，针对国民党内存在的“反共”、“防共”心理，孙科提出对中共问题不能反潮流，“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反共，不但违背世界的潮流，而且没有认清自己的环境”。今后，“首先要扫除反共的心理。我认为今天要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绝不可也绝不能用武力”，只能“以政治方法求解决”^④，要允许中共合法存在。194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并在重庆秘密征求部分人士意见。孙科等人建议，不妨提议扩大国防最高委员会，并通过联合的国防委员会来改造政府，筹备选举，制定宪法。因此，1944年5月蒋介石甚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诬蔑政府，与中共合作，以俄人为盾。此点虽非事实，但孙科在此期间确与在重庆的中共人士接触较多，也是中共重点关注、团结的对象之一。1944年7月15日，毛泽东在给党内《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中提到，“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⑤。1945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与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阐明中共方面的立场，其中即包括孙科并宴请了孙科等人。9月1日，孙科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鸡尾酒会，宴请了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孙科出席并主持。

总之，抗战时期，是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的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孙科基本上维持了与中共接近的立场，是较为坚决的抗战派、亲苏派、和共派。他以其特殊的身分和地位，在推动团结抗战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作为一个信仰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国民党领袖，能够这样做，说明他还是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摆在较为重要的位置的，不管他出于何种考虑，对其历史作用不应抹煞。他这样做与这时期他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过从较多，在政治上经常与他们保持同一姿态有关，也使得抗战时期成为他个人历史上较有些光彩的一个时期。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使他在这一时期能够在一些重要方面大体上接近了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均提出了某些有进步倾向的主张，因此中国共产党将他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阵营区别出来，而视之为国民党内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

（本文作者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广州 510631）

（责任编辑 萧 军）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页。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09页。

③ 《中苏文化》（重庆）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7月。

④ 孙科：《三民主义新中国》，商务印书馆1946年上海版，第61～62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